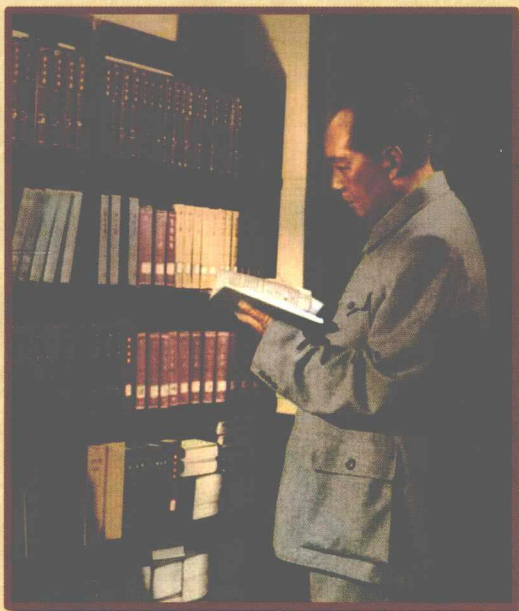




广州市宣传文化出版资金

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会 编



毛泽东

哲学思想研究三十年

中央文献出版社

毛泽东哲学思想 研究三十年

(1981—2011)

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会 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三十年 / 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会编.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12

ISBN 978 - 7 - 5073 - 3439 - 5

I. ①毛… II. ①全… III. ①毛泽东思想: 哲学思想
- 文集 IV. ①A841. 63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37341 号

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三十年

编 著/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会

责任编辑/韩 冰 (010 - 66551519)

出版发行/中央文献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四北大街前毛家湾 1 号

邮 编/100017

网 址/www. zywxpress. com

经销热线/ (010) 63097018 (010) 66183303 (010) 66513569

经 销/新华书店

排 版/北京方方激光照排中心

印 刷/北京新魏印刷厂

787 × 1092mm 1/16 开 44. 375 印张 705 千字

2011 年 1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73 - 3439 - 5 定价: 86. 00 元

本社图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三十年

(1981—2011)

编委会：石仲泉

许全兴 陈占安 周 直 胡振平

唐洲雁 薛广洲 郭建宁 汤应武

徐素华 杨明伟

主 编：石仲泉

副主编：唐洲雁 杨明伟

参编人员：程美东 刘志辉 曹慧娟 田曼殊

目 录

在实践中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	胡 绳 (1)
从历史决议谈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学习和研究	龚育之 (10)
联系《决议》学习和运用毛泽东哲学思想	邵华泽 (34)
毛泽东哲学与新中国 60 年	石仲泉 (47)
民族英雄毛泽东的世界观和价值观	李君如 (60)
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伟大贡献	杨瑞森 (67)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特点及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主要贡献	樊瑞平 周向军 (81)
毛泽东价值观及其当代意义	周 直 (90)
论毛泽东哲学的世界历史意义	薛广洲 (96)
中国哲学的“合题”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哲学意义和历史地位论析	吴 军 (104)
论毛泽东哲学的当代性	陆剑杰 (112)
毛泽东精神与中国与世界同在	胡为雄 (128)
对毛泽东思想形成问题的探讨	韩 钢 (140)
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直接思想理论来源	金 羽 石亚军 (149)
毛泽东读 20 世纪 30 年代苏联哲学教科书	邱守娟 (159)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时期是怎样教导我们学哲学的	温济泽 (170)
毛泽东哲学思想形成的标志是延安整风	唐洲雁 (180)
进一步开展毛泽东哲学思想史的研究	苏厚重 (187)
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科学体系	刘 嵘 (190)
论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	刘纲纪 雍 涛 陈祖华 李南熏 (201)

毛泽东哲学的整体观新探	杨明伟 (215)
论毛泽东认识论思想的特点	潘宝卿 (222)
《实践论》三题	龚育之 (232)
《实践论》、《矛盾论》与苏联三十年代哲学的关系	许全兴 (247)
《矛盾论》的历史地位	杨春贵 (256)
试论毛泽东同志关于质和量的辩证法思想	张伊宁 (271)
战争中的辩证法	
——学习《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一点体会	
..... 陈葆华	张文儒 (281)
毛泽东军事著作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林伯野 (300)
实事求是思想方法的形成和发展	宋一秀 (319)
全面理解物质变精神, 精神变物质的认识论思想	张江明 (325)
毛泽东改造主体思想论要	刘林元 (337)
毛泽东实践哲学论要	李佑新 (352)
毛泽东实践概念的比较研究	萧诗美 (364)
学习和运用毛泽东调查研究的理论	孙克信 佟玉琨 (381)
毛泽东《农村调查》及当代价值	刘毅强 (387)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国家学说与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	杨先农 (394)
毛泽东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思想及其当代意义	胡振平 (403)
略论毛泽东处理十大经济关系问题的辩证思维	张俊国 (415)
试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社会传播路径	陈金龙 (423)
简论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的特点	李 毅 (435)
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理论当代实践价值的探讨	程美东 (440)
毛泽东《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的笔记》	
哲学思想初探	范贤超 (445)
毛泽东社会统筹发展理念解析	张喜平 (451)
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对唯物辩证法的发展	
..... 齐巧霞 彭 臻 沧 南	(460)
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及其哲学思考	汤应武 (471)
浅论毛泽东的和谐思想	孙映球 (480)

毛泽东哲学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石仲泉 (485)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哲学根据	冯贵贤 (506)
毛泽东哲学思想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余品华 (513)
毛泽东辩证法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冉昌光 (522)
破题、定调、立论	
——毛泽东的“第二次结合”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	韦日平 (527)
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庄福龄 (538)
《实践论》、《矛盾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雍 涛 (556)
建国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及其基本经验	田克勤 (570)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历史、现状与方法论	郭建宁 (578)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	魏胤亭 (591)
关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中的两个问题	韩树英 (603)
关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陈占安 (619)
关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特点的研究方法问题	陈建中 (637)
创建毛泽东方法学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沧 南 (641)
毛泽东科学方法论的思想理论渊源	李恒瑞 (655)
论毛泽东学理论体系的建构	王立胜 (662)
论毛泽东哲学方法与邓小平哲学方法	施维树 (671)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西方关于毛泽东及其思想	
研究的趋向	萧延中 (679)
1981 年前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的一些情况	于良华 (688)
回忆历史 思考问题	
——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会 30 年的回顾	徐素华 (691)
后 记	(704)

在实践中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

胡 绳

“在实践中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这个题目很大。这里我并不企图把这个题目下的所有意思都讲到。

关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本精神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并贯穿于毛泽东思想的其他组成部分中，也可以说，毛泽东哲学思想是整个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当然，毛泽东思想是不能脱离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同志说过这样意思的话：马克思主义好比一棵大树的主干，我们是它的一个支干。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又确实在许多方面对马克思主义有所发展，有所丰富。它有自己的特点，这是同把马列主义中国化分不开的。因为这种丰富和发展正是在把马列主义运用到中国，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实现的。

毛泽东同志在1938年就说过：“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①

哲学中的抽象概念，是不能脱离具体事物而独立存在的。哲学界曾经有一个学派，认为抽象的东西是能够独立存在的。比如说“圆”吧，客观世界上实际存在的是各种各样的圆的东西，是具体的圆。他们认为既然有圆的概念，就一定有一个离开各种具体物体的抽象的“圆”的客观存

* 本文是作者1983年12月9日在第二次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讨论会上的讲话节录。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在。这种说法是假装的唯物论，实际上是唯心主义。我们是怎么得到圆的概念呢？是概括了客观事物中各种各样具体的圆的东西而得到的。我们所看见的，只能是各种各样具体的圆的东西。这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共性存在于个性之中，普遍性存在于特殊性之中。共性、普遍性、一般性不能孤立地存在。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所讲的一般的抽象的原理，都表现在具体的事物中间。我们在中国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般原理运用到中国的实践中。有人轻视运用，认为这不过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运用了一下，算不上是理论的发展。但是，要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必须把它运用于具体问题。如果只是从概念到概念，是不能解决什么问题的。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解决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例如中国的革命战争，中国的统一战线问题，中国革命过程中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分裂、斗争、联合的问题，中国革命斗争中的战略和策略问题，等等。在这些问题上，他具体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正是通过这种具体运用，才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般原理得到更充实、丰富的说明，赋予了更丰富的内容。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这一特点，我们要特别予以注意。只有学会具体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般规律，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得到发展。有人好象认为，既然是一般的概念，只要在一般的概念和规律上面作文章，就能够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显然是不对的。

还有一个民族形式问题。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分离起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做法，我们则要把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① 这里所说的民族形式，包括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具体运用于中国实践，也包括概念的表达方法。邓小平同志说：“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② 毛泽东同志强调，要用马克思主义对我们的历史遗产给以科学的总结、批判的总结。大家都熟悉毛泽东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44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8页。

同志的这句话：“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① 这些思想遗产，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社会和中国历史的特点。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继续。我们要研究今天中国的特点，就不能不联系到历史上中国的特点。这些历史遗产所提供的带有中国色彩的思想材料，对我们的哲学研究工作也有很重要的意义。我们对世界上别的国家的思想遗产也要研究，特别是那些已经成为全人类共同的思想财富的遗产；当然我们尤其要重视和研究中国的历史遗产。

我们中国哲学界现在还存在着研究现实不够的问题。研究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及其特点，研究其规律性，是我们的理论工作者，包括哲学研究工作者的当前的任务。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同志和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正是这样做的，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根本原则，运用于指导当前的运动，研究运动的特点，研究它的规律性。但是，我们的哲学研究工作，在某种程度上，还存在着从概念到概念，不注意普遍原理如何具体运用的倾向，还存在着把理论的运用看成好象是与理论的发展不相干的另一回事的倾向。此外，我们的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还没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研究密切结合起来，可能也是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应该说，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是很有成绩的。但好象哲学史的研究是哲学史的研究，辩证唯物主义的研究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研究，二者没有结合起来。我们没有象毛泽东同志那样善于总结中国哲学史、思想史上的丰富的遗产，经过批判地继承，用以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和其他许多包含着丰富哲学思想的著作，从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中，深刻地论述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下面就这方面说一点意见。

在认识论方面，毛泽东同志提出实践出真知。认识的源泉是社会实践，实践贯穿于整个认识过程，正确认识的取得一刻也不能脱离实践活动。人们从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中取得某种认识，再用以改造客观世界，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和效果，这种认识的正确性就得到了完全的证实。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要取得正确的认识，做到主观和客观完全符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合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常常要经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反复过程。认识的对象越是复杂，就越是要更多地经过这种反复的过程才能达到完全正确的认识。从实践中得到的认识，还必须通过实践，加以充实、发展，并且纠正其中不符合或不完全符合实际的部分。这就是说，正确的认识是来源于实践，又经受实践的检验，而最终为实践所证实。所以毛泽东同志说：“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认为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排斥一切否认实践重要性、使认识离开实践的错误理论。”

当然不能说，凡是来源于实践的认识就一定是完全正确的，因为正确的认识往往不是一次形成的。但是可以说，脱离了实践的认识就一定是错误的。如果根据这种认识去改造世界，那就只能碰壁，只能失败，只能得到和预期目的相反的结果，因而也就充分暴露了它的错误。是否只有看到碰壁和失败的结果时，才能判定这种认识是错误的呢？不是的。如果认为任何认识在实践未检验其是否达到预期的效果和目的时，我们就不能对是非作任何判断，仿佛一切是非在这时都是不可知的，这种想法是不对的。我们坚持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的观点，一方面要谨慎地从改造世界的实践中认识世界，并且通过实践检验已有的认识，同时要排斥脱离实践、背离实践的认识，因为这种认识是不可能在实践中得到证实的。例如有人提出社会主义异化论，并且把人性、人道主义和异化论结合起来，宣称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改革要以所谓异化和人道主义理论为基础。是不是要等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证明其不能达到预期的结果，方可以判定其错误呢？不是的。我们现在就可以判断，这些论点是站不住的，它不能成为改革的理论根据，不可能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中的种种问题，因为这些论点从根本上是脱离实践的，其出发点就是背离社会主义实践的。

用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观点来考察问题，所得出的结论往往也好像有一点事实的根据，但那只是对事物的表面的肤浅的反映，不能正确反映事物的内在联系和事物的本质。这种结论是经不起实践考验的。毛泽东同志指出：“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毛泽东同志关于认识与实践的辩证关系的完整的科学论述，通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不断开拓认识的前进道路的论断，是对认识论的重要贡献。

在辩证法方面，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历史决议中指出：“毛泽东同志阐

述和发挥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核心——对立统一规律。他指出不仅要研究客观事物的矛盾的普遍性，尤其重要的是研究它的特殊性。”具体地分析具体的矛盾，具体事物要具体分析，这是十分宝贵的辩证法思想。三中全会以来，党在各项工作中都强调了这一点。具体条件，具体环境，事物的发展处在什么阶段，什么历史条件，什么特点，都要进行具体的分析，这样才能正确地确定工作方针，指导我们的工作。毛泽东同志在讲矛盾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的同时，又讲了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问题。他指出，矛盾的同一性是在于对立的双方相互依存，又能够互相转化，并指出同一性是暂时的、相对的、有条件的，而对立的互相排斥和斗争是绝对的。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对于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作了详尽的深刻的论述。否认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看不见互相矛盾、对立的诸方面在一定条件下互相渗透和依存，并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那是错误的。而否认矛盾诸方面的斗争性是绝对的、无条件的，也是错误的。

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不但把辩证法歪曲为“斗争哲学”，而且把哲学中的斗争性概念庸俗化。破口大骂，拳打脚踢，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你死我活，就是他们所说的斗争。这样解释斗争性，只是糟蹋了辩证法思想，使人无法承认斗争性的普遍存在。哲学概念是高度的概括，它不同于日常生活用语，但因为很难用适当语言来表达，就往往不得不借用日常生活中的语言。所谓“同一性”、“斗争性”都可说是借用了日常生活的用语。但它们作为哲学概念，具有远比日常生活用语丰富的含义。既然斗争性是普遍存在的，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当然它在各种不同的具体事物中表现为各种不同的形式。哲学上的斗争概念包括互相排斥、互相抵触、互相摩擦、互不相容、互不协调等等。在人与人的关系中，斗争固然可以表现为破口大骂，拳打脚踢，也可以表现为批评、教育、劝告、请求，等等。请求怎么也是斗争呢？比如蒋介石国民党不抗日，学生请愿，这不是一种斗争形式么？在同志间，你请求我做或不做某种事，这也可以是一种斗争形式。一般性存在于个别性之中。我们不能只承认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而否认斗争性。重要的是要具体分析各种斗争的形式。《矛盾论》中指出了对抗和非对抗这两种矛盾斗争的形式。这还是最概括的分析，在实际生活中，矛盾的斗争表现为极其多样的形式。

毛泽东同志阐明了有条件的相对的同一性和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相

结合，构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并且把列宁所说的“在相对的东西里有着绝对的东西”发挥为“在同一性中存在着斗争性；在特殊性中存在着普遍性；在个性中存在着共性”。这些是唯物主义的辩证法的精髓。

在社会发展中，即使到了将来大同世界的共产主义社会，也还会有社会矛盾要解决，否则社会就不能前进。那时人们中间也还会有先进思想和落后思想的矛盾，还要用先进思想克服落后思想。现在我国虽然已经进入消灭了剥削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但是我们在坚持对外开放政策时还会遇到资本主义思想的侵蚀，国内在一定范围内还存在着阶级斗争，还存在着反社会主义势力，这就要求我们善于按照辩证法办事，也就是说，要善于正确区别和处理虽然少量、但不可忽视的敌我矛盾和大量存在的人民内部矛盾。在人民内部要用正确方法以无产阶级思想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以新的社会主义精神风格克服旧社会的种种残余，以先进克服落后，使落后转变为先进，达到更好地团结全国人民共同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的。

关于怎样才能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

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哲学思想这一问题，在哲学界有过讨论。有的同志认为，要发展哲学第一要重视当代自然科学的新发展，第二要重视和研究人的问题。对于这样的提法，我觉得还有值得讨论的地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的确要同自然科学的发展相联系，要概括和总结自然科学发展的新成果。但这只是一个方面。与此同时，还必须与社会政治实践、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联系起来。这后一方面是不可忽略的。至于人的问题，当然可以而且需要进行研究。西方哲学界提出了许多关于人的根本观点，我们要弄清他们到底说的是什么。研究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问题必然要涉及社会主义的伦理道德观念，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是我们的伦理道德观念的一个重要内容，当然也要研究。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什么关系，它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有什么本质区别，这样的研究也是必要的。但如果把这样的研究看成是发展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一个根本方面，我看是不恰当的。因为这并不能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重大的根本问题。

关于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哲学思想这一问题，我想有以下几点是值得提出来的。

首先，要研究社会主义新的实践。

我们主要是研究、总结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经验，研究我国社会主义正在发展中的新的实践。当然也要研究各国社会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实践。尽管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还有许多困难要克服，也出现过错误，但毕竟是取得了伟大的成就的。我们不要小看了自己。世界上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关心人类进步的人们，对我们是抱着殷切的期望，很关心我们的国家的发展的。我们的党和国家能够从十年“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中迅速地恢复过来，走上正确轨道，开创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最终将会证明，在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国家中，按照自己的特点，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是人类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我们还面临许多要解决的问题，许多要克服的困难，道路是不平坦的，但这里面也就有许多新的经验，这就要求我们去研究新的问题，总结新的经验。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和具体分析具体情况的方法，坚持用辩证法，而不是用形而上学来对待历史经验，并且按照客观事物中存在的矛盾运动的规律推动社会的发展，这些都使辩证法、唯物论的基本原则大大向前发展了。我们作为哲学工作者，应当认真地研究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的实践。

第二，哲学工作者应当参与研究并答复经济学、历史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教育学、文艺学、军事学等领域中各方面的问题。

当然，上边说的这些学科领域中的问题，并不是哲学工作者都能解决的，还要由各具体学科的专家加以研究、答复。但是，哲学家要参与回答这些问题。这些学科都要研究我国社会主义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这里边必然有许多方法论问题，认识论问题，也可以说，各个部门中都会提出哲学问题。哲学工作者应该参与研究并解答的主要就是这一类问题。在哲学史上，其实从来没有单纯的哲学家。哲学家总是具有广博的知识，或者对哲学以外的某种专门学科有一定的造诣。哲学家如果只是在哲学概念上转来转去，这既不能解决什么实际问题，也不能使哲学向前发展。要把哲学的基本理论运用到具体问题上去，就不能没有各种专门科学的帮助。在“文化大革命”以前，作为哲学普及工作，曾经提倡工人、农民“学哲学、用哲学”。对这也要具体分析。学了要用，这是好的。但当时的提倡带来一种错误的看法，似乎哲学的概念、原理可以简单地直接地运用到具体问题上。其实凡是运用得比较好的，总是对所研究的对象有具体科学

知识的人。没有任何具体科学知识的帮助，只是引用几个哲学的概念、原理，是不能真正解决什么问题的。所以有必要强调，把哲学和各门具体科学知识结合起来。现在，科学门类愈来愈多，哲学工作者不可能每门都懂，更做不到门门精通。但是，应该对某一门或某一方面的学科进行比较深入的研究。在这里也有哲学家和其他专门家合作的问题。

第三，要结合自然科学的新发展。

当代自然科学正在迅速地向前发展。哲学研究工作者要关心自然科学的新发展，并和它结合起来。近年来这一点已引起哲学界的重视，这里就不多说了。

第四，应该对资产阶级哲学、资产阶级社会学进行批判。

现在有一种看法，认为我国剥削阶级已经消灭，阶级斗争已不再是主要矛盾，所以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就没有必要了。这种看法是不对的。思想没有国界。就全世界范围来说，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思想上的斗争还尖锐地存在着。在我国，由于各种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阶级斗争也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而且在某种条件下还可能激化。因此，批判资产阶级思想以及其他非无产阶级思想，在我们这里仍然是一个重要任务。当然，我们在进行这种批判的时候，要从过去我们进行学术批判时发生过的错误中吸取教训。有的同志提出，要区别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这在一定范围内是可以区别的。但是，也不能不承认，二者并不是处处都能绝对划分开的。如果说我们回避政治问题，而躲到所谓纯学术问题上去，那并不是健康的现象。

例如，如何评价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不是有个马克思主义的异化理论，异化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概念，异化可以用来解释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种现象吗？这些可以说是学术问题，但它们确实具有政治意义，因为这些问题是涉及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涉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如果讨论某个确是具有政治意义的学术问题，不指出它的政治意义在哪里，只说是学术性问题，那是不行的。应该把从敌视社会主义立场出发散布某种错误观点的人，和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人区别开来。既然有政治意义，我们就不应该回避，而应明确地指出来，这并不等于是用政治帽子压人。我们过去进行的思想批评，如前所说是积极成果的，不能完全否定，但确实有缺点，其中之一就是没有进行认真研究，有的很浅薄，有的未能恰到好处，没把问题说透，浅尝辄止，没有认真下功

夫去研究。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批评，是不能简单地戴几个政治帽子了事的。要批判资产阶级哲学思想，必须认真地研究，说出道理来，这样才对我们有用。我们批判胡适思想，不是为了打倒一个胡适，现在这个人虽然已经故世，但也还值得加以研究、批判，那是为了在许多重要问题上把马克思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区别弄清楚，这样才有利于马克思主义向前发展。那么，马克思主义是不是可以从资产阶级哲学、社会学吸取对我们有用的东西呢？可以的。但首先必须在原则上划清界限，从根本上予以批判，然后才能够从中吸取某些思想资料以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内容。

我们的思想界，在今天这样的世界环境中间，在我们的社会主义正逐步向前发展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不断产生涉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涉及是不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自觉或不自觉地震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背离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倾向，会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出现。这并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作为马克思主义者，要能够在这种情形出现的时候，用正确的方法来进行批判。这个批判是讲道理的，不是以势压人。简单化的办法是不行的。要保证马克思主义思想在我国的主导地位，克服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我们必须进行以认真的科学研究为基础的论争。这就是前面引用过的毛泽东同志的话，真理是在同谬误的斗争中发展的，这是一条规律。无产阶级思想总是在同资产阶级思想以及其他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中向前发展的，这在世界上还存在阶级的时候，也是一条规律。这是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长期任务。思想斗争包括批评、分析、研究。要解决思想领域的问题，解决带有学术性质的问题，绝不能靠简单地戴几顶政治帽子，也不能只靠援引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说过的话。要认真研究，讲清道理，要真正地联系新的实践，说出一些新的道理来，这样才能在斗争中发展真理，向前发展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哲学思想。

从历史决议谈毛泽东哲学思想 的学习和研究^{*}

龚育之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我们党（还有党外的许多同志）的集体智慧的成果。公开发表以后，全党学习，广大群众学习，已经变成了大家的共同财富。《决议》起草的过程中，我们理论界、哲学界的同志们，直接间接地参加了很多工作。可以说，《决议》集中集体智慧，其中包括我们理论界的智慧。中央组织的关于《决议》草稿的历次讨论，都有不少理论工作者参加；起草小组也找过一些理论工作者座谈，向他们请教。不仅如此，作为一个总的背景，从粉碎“四人帮”以来，从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和批评“两个凡是”的观点以来，从三中全会以来，我们理论界、哲学界在拨乱反正方面进行了很多有成效的科学研究工作，这些工作作为《决议》的起草作了一个方面的准备。现在的《决议》吸取了、反映了理论界、哲学界拨乱反正的科学研究成果。《决议》发表以后，理论界的同志们又围绕《决议》作了很多研究，从这次会议上大家提出的论文和进行的讨论中间就可以看出来。至于我自己呢，由于水平不高，也由于努力不够，对《决议》涉及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问题，没有系统的研究。很多同志比我有更深刻的专门的研究。我今天讲的是自己的一点粗浅的体会，讲三个问题。

—

第一个问题，我想讲讲，《决议》应该成为我们研究毛泽东思想的新起点，当然也应该成为我们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新起点。

中央反复强调，《决议》的核心问题，就是要科学地阐述毛泽东同志

* 本文是作者 1981 年 10 月 12 日在第一次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讨论会上的发言。